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ABROAD: A COLLECTION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美] 魏斐德等◎著

孙卫国◎译

※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系列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明清史研究

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美] 魏斐德等著 孙卫国译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美)魏斐德等著;孙卫国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朱政惠主编)

ISBN 978-7-5326-2583-3

I. 中... II. ①魏... ②孙...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明清时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290 号

责任编辑 陈翔燕

装帧设计 汪溪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9.75 插页 1 字数 164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2583-3/K·574

定价: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序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科建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在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本土史学的研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本方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与对象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注意对象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对象国学术思潮的互动关系等。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很赞同李学勤教授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其研究取向与研究

方法有很大的相通性。

海外中国学包容宽泛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不能单独穷尽其研究,所以对它的探讨,必须有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如果每个学科都能根据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深入对其相关领域的探讨,那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有可能在整体上获得重要突破。

我们之所以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介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只是因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时间较长,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国家的汉学、中国学缘起及其主要成就,都相对集中于对中国历史等人文问题的探讨。在美国,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还是“二战”后的现代中国学形成,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集中于历史及传统文化的探讨,尔后社会科学逐步介入,转入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态势。所以从历史学突破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种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尊重,也是针对性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必要手段。诚然,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仅仅从一个学科来把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渊博学识才有可能应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研究局势和研究对象。

中国的崛起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使这一探索工作更具魅力而富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总的说,这项工作还属于起步的阶段。目前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翻译丛书已有不少,各家都有自己的用心和重点。参考诸家丛书发展特色,本丛书将把重点放在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上,包括对象国汉学史、中国学发展史的梳理、回顾和总结,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中国学机构成就的探析和解读;当然,为了了解当前国际汉学发展前沿与思潮动态,也将重点翻译和推出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学术名著,包括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重要学术成果。为后人留存史料、保持珍贵历史记忆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探索,将是我们这套丛书的重要使命,为此,我们还将努力推出一些自己的原创性成果。研究和批判人家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繁荣。

三十年改革开放重新点燃了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不熄热情,衷心期望我们的努力成为通往成功之径的小小铺路石。

编者
2008年3月

译者前言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前往迎接。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1〕}会谈之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外交关系才逐渐走向正常化。几乎与此同时,中美学术的交流也开始积极稳步地推进,一个新的交往的时代即将来临。

事实上,早在1966年,美国就成立了对华学术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SCPRC),该委员会当时是由美国学术社团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美国社会科学院(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等联合组成的,还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有关财团的经费资助。其成员由来自全美的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等相关领域内的学者组成。该委员会旨在鼓励和支持美国学术界个人或者相关机构开展与中国的学术界交流、出席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或者参与中国的科学与学术方面的事务。但由于中美之间二十几年的隔绝,不仅政治上敌视,学术上彼此之间也是毫无交流、所知甚少。直至尼克松与周恩来的握手,才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遂着手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这样从1974年开始,美国就按照学科陆续组织专家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一则了解中国的学术研究动态,二则摸清中国相关的学术机构、专家,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从而为以后双方的交往奠定基础。

〔1〕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裘克安等译,2001年,第672页。

每个代表团都是从全国征求最具代表性的专家组成,一般十人左右,前往中国的时间为三四周不等。代表团成员中,一定会有能讲中文的专家,而同时,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也派遣随行翻译。中国方面则多是由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充当美国代表团在中国的主人,并安排他们前往中国相关的大学访问。中美之间正式的学术交往就这样开始了。正如当时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主席西蒙(Herbert Simon)所说的:“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她对外国观察家关闭大门如此之久,而了解其开放的过程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持续不断的变化特色,也具有无穷的魅力。”〔1〕每个考察团返美之后,一定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由每位参与者共同讨论,分别执笔,最后商榷再三,才成定稿,上交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

这些报告大多出版了。第一份报告出版于1976年,是有关固态物理学的访问代表团的报告〔2〕;第二份是有关昆虫防治方面的访问代表团的报告,出版于1977年〔3〕;第三份是有关基础与应用数学的〔4〕;第四份则是美国古人类学家访华代表团的报告。〔5〕事实上1975年5月,这个代表团就来华访问,两年后1977年才完成并出版访华报告。以后还有地震工程、核科学等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并提交和出版了相关的访问报告。可见,美国最早的访华计划是有关自然科学方

〔1〕 参见 *China Bound: A Guide to Academic Life and Work in the PRC*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7), “Foreword”, pp. 7.

〔2〕 *Solid state phys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trip report of the American Solid State Physics Delegation: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 report; no. 1),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76.

〔3〕 *Insect contro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trip report of the American Insect Control Delegation,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 report; no. 2),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77.

〔4〕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trip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Delegation: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 report; no. 3),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77.

〔5〕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trip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aleoanthropology Delegation: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77.

面的。

在这样频繁派出学术代表团前往中国考察的大背景下,1978年,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的代表与中国方面协商,提议第二年美国派遣一个由十位明清史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方采纳了这个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随即发出邀请函,邀请美国代表团于1979年6月来华访问四个星期。代表团一共由十位明清史专家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大学,都是颇有成就的专家。成员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 Walter 与 Elise Haas 荣誉教授)、罗友枝(Evelyn S. Rawski, 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贺凯(Charles O. Hucker, 密歇根大学中文和历史系荣誉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蓝德彰(John D. Langlois, Jr., 纽约摩根保证信托公司)、韩素瑞(Susan Naquin,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彼得森(Willard Peterson,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司徒琳(Lynn Struve, 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与文化教授)、王业键(Wang Yeh-chien, 肯特州立大学东亚史教授)、卫思韩(John E. Wills, Jr., 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于1979年6月4日,由东京飞抵北京,一直到6月30日离开北京飞赴东京,在华四周时间,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北京、承德、济南、曲阜、泰山、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

返美后,代表团十位专家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最后由主编魏斐德教授定稿,将报告交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作为“中国研究丛书”(China Research Monograph)第十七种,于1980年出版。正如其前言介绍的:“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旨在通过这个代表团的访问,开展中美两国高层的学术交流,以一些专题讨论和非正式的学术会议,了解中国的明清史研究状况,同时汇报这些领域内美国学者的研究状况;参观图书馆和档案馆,以便日后美国学者进行个人研究时,能够利用这些资源。”

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乃是记录美国明清史代表团四周时间内在中国旅行的见闻,重点介绍了在华北和华东地区所参观的博物馆、所游览的历史名胜古迹。有许多切身的描写,给人亲临其境的体验。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的图书馆与档案馆,重点介绍馆藏的明清史资料,这是为美国学者以后来中国查阅明清史资料而准备的。对于当时中国各个大学里明清史的研究中心与相关的专家,也有所介绍。这样美国学者不仅能够找到资料,而且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交流与讨论。

第三部分是综合在中国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归纳出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加以介绍。既介绍了中国的研究状况,同时略加评价。第四部分则是介绍中国即将出版的明清史著作及当下的研究取向。因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在历经“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还未完全从这种伤痛中恢复过来,书中也处处流露出这样的描述。而所研究的领域也还未摆脱“文革”的影响,所以,书中所讨论的问题,还是主要与之前中国历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1〕密切相关的,而本书中所讨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动向”,皆是“五朵金花”的内容,当然也发现了中国明清史学界研究的一些新动向:例如中西关系史、法制史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回顾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中国的明清史研究应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现在学术界不太关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起义的研究也早就式微了,但是当年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正开启了当今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地域史的研究先声吗?从学术史的层面讲,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因为一代有一代关注的问题,而每代之间,都能看到彼此的关联。

过去三十年的时间,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变。报告中多处提及当时的中国几乎很少有人出国留学,大多数的人也不懂外语,对于外面世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所以美国学者主动前来中国了解情况。事实上,今天情况早就大不相同了,留美的中国学生数量长期居于在美外国留学生的首位,而短期出国访问的中国学者也遍布于美国各个大学,因而今天的交流是三十年前所无法想象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实际上,从美国学术界那种积极了解中国学术的过程中,也给我们今天去了解美国的中国学提供了许多的借鉴意义。可以说,在美国学者了解中国研究状况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了解他们的研究状况。尽管我们对美国学者的研究状况了解也非常之多,但相对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似乎还缺少点东西。他们的了解是直接的、全方位的,从资料到研究状况,他们都进行实地考察,甚至与相关研究专家进行直接接触与交往,这样可以最直接地了解研究状况和当下的研究热点,从而做到研究上同步进行。而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以及西学的了解,很少能做到同步。我们主要关注他们已出版的著作,并进行翻译出版,但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中国学专家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我们并不太了解,所以我们的了解总是有些

〔1〕 所谓中国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即指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滞后。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太可能组织这样的专家考察团,尽管有不少学者前往美国学习访问,但大多数的学者不太可能前往美国,直接与美国学者交往。因此,在我们翻译外国著作,介绍外国研究动态的同时,加强与美国学者的直接交流,可能是弥补我们这一缺陷的一个有效办法。

翻译这本书,前后近两个月时间,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的信任与鼓励,尽管我告诉他自己从未译过外文著作,他还是很信任地将此书交给我,而且说不用考虑出版问题,使我才有机会翻译这本书。而翻译过程中,陈学霖教授从美国发来邮件,给我答疑解惑。尽管陈先生不是当时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但他对于这次访问的经过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也给予了帮助,书中多处提及对陈先生的感谢。有陈先生的指导,更增强了我翻译此书的信心。好友黎明教授通读了一遍译稿,非常细心地指出文句不通之处,还查对了一些人名,给本译稿增色不少。在此对诸位先生的指教、鼓励与帮助谨表感谢。当然因为时间有限,加上译者功力不够深、经验不足,译稿肯定还有不当之处,则概由译者负责,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卫国

2008年8月1日于香港

谢 辞

这份报告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共同合作的作品。每位成员都读过初稿,在访华归来三个月后,大家又都聚集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对每部分加以商讨斟酌,仔细修改。在编辑过程中,有些部分从这篇移到另一篇,每篇的编者都赞同这样的修改,并接受每个部分的最后定稿。但作者的荣誉属于各位撰稿人,他们的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篇,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第二篇,卫思韩(John E. Wills, Jr);第三篇,卫思韩;第四篇,司徒琳(Lynn Struve);第五篇,韩素瑞(Susan Naquin);第六篇,孔飞力(Philip A. Kuhn);第七篇,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第八篇,孔飞力;第九篇,贺凯(Charles O. Hucker)、蓝德彰(John D. Langlois, Jr.);第十篇,司徒琳;第十一篇,王业键(Wang Yeh-chien);第十二篇,韩素瑞;第十三篇,魏斐德;第十四篇,卫思韩、蓝德彰、彼得森(Willard Peterson);第十五篇,韩素瑞、彼得森、魏斐德、王业键。

附录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要特别感谢司徒琳博士,因为她对于我们参观过的每一个机构和我们见过的每个人都作了详细的记录。

我们诚挚地感谢所有接待过我们的中国博物馆、大学、研究所、档案馆与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有关名单都列入了附录的人名录中。其中,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大使馆乡先生^{〔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

〔1〕 译者按: 宦乡(1909—1989年),字鑫毅,笔名范慧、范承祥,贵州遵义老城人。1932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肄业。一度赴英国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于《前线日报》和《文汇报》。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4年出任中国驻英代办,1963年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随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席第一、二次日内瓦会议,并参加中国和意大利建交谈判。“文革”中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并兼任驻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两年后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又任世界经济导报社名誉社长等职。1989年2月,病逝于上海。宦乡于1979年6月从欧洲大使任上归来,故美国学者称他为“大使”。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王毓铨和清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戎笙。中国社科院的王戎笙和崔建军陪同我们一起参观了四个星期。

假如没有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CSCPRC)会长布拉克博士(Dr. Mary Bullock)和委员菲尔沃克博士(Dr. Albert Feuerwerker)与荷弗海恩斯博士(Dr. Roy Hofheinz)的支持与组织,这个代表团根本就不可能组成,更不用说去中国访问了。作为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特别要感谢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职员办公室的帕茨西娅·兹西坦尼(Patricia Tsuchitani),她不仅组织了这次旅行并陪同代表团访问中国,而且回来后,又帮助我们整理这份报告。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的资助下,内德·戴维斯(Ned Davis)、迈克尔·马亚斯(Michael Maas)、约翰·乌伯利(John Woodbury)不仅帮助筹备这次访问,尔后又修改报告,以备出版。罗伯特·克伦帕特博士(Dr. Robert Krompart)审查了手稿的最后版本,林飞霞(Lin Fei-shia)抄写了词汇表中的汉字。都一并谨表谢意。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谢辞	7
 一、前言	1
 旅 行	5
二、华北的博物馆与历史名胜	7
三、华东的博物馆与历史名胜	22
 参观的图书馆与档案馆等机构	29
四、图书馆	31
五、明清档案馆	37
六、第二历史档案馆	50
七、有关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原始资料	52
八、大学及其历史系	60
 历史问题的讨论	69
九、明断代史与明代制度史	71
十、明清易代史	75
十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79
十二、农民战争研究	85
十三、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动向	9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十四、明清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中西关系、法制史和思想史	104
----------------------------------	-----

尾 声	111
-----------	-----

十五、未来的出版物与研究机会	113
----------------------	-----

附录一 旅行日志	118
----------------	-----

附录二 省级档案与地方资料	122
---------------------	-----

附录三 国家文物保护的明清历史遗址	126
-------------------------	-----

附录四 访问的机构及相关人物名录	129
------------------------	-----

后 记	141
-----------	-----

一、前言

1978年,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的代表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提议第二年美国派遣一个由十位明清史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方采纳了这个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随即发出邀请函,邀请美国代表团于1979年6月来华访问四个星期。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旨在通过这个代表团的访问,开展中美两国高层的学术交流,以一些专题讨论和非正式的学术会议,了解中国的明清史研究状况,同时汇报这些领域内美国人的研究情况;参观图书馆和档案馆,以便日后美国学者进行个人研究时,能够利用这些资源。

明清史学研究自然很符合美国汉学界的需要。当今美国大学大多数研究中国的专家都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尤以集中于明清史的研究为多。当然,他们的研究兴趣很广泛,互不相同。美国对华学术委员会挑选了部分成员,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研究领域,如明初制度史、明初法制史、明清易代史、清代经济史、十七世纪思想史、民众暴动与民间宗教史、太平天国史等领域。然而,中国对一些与当下密切联系的领域有特殊的兴趣,例如经济史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社会史领域中的农民战争问题。同时,美国学者所界定的明清史范畴与当今中国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因为中国把鸦片战争(1839—1842年)看作其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明史与清前期史隶属前者(在历史所)^{〔1〕},而晚清史隶属后者(在近代史所)。而且,中国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一分为二,界限分明。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倾向于研究古代史,尤其是汉宋间(公元前206—1279年)的历史,而年轻的学者更注重1839年以后的历史,尤其是1919年以后的历史。因而,介于其间的明与清前期史的研究,相对而言在中国不如在美国受重视。

〔1〕 译者按: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者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尽管有些不对等,但我们的代表团在四个星期的访华期间,基本上实现了我们所有的预期目的。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一些地方分支机构的慷慨合作,我们得以参观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古迹、博物馆,访问了一些大学,并考察了不少图书馆。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王戎笙副主任的陪同下,我们在北京参观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我们是此馆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学者代表团。同时,我们在南京也参观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所参观的每座城市,我们以演讲的方式介绍了美国明清史的研究状况,而通常在演讲之后的讨论中,我们能够了解大量的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动态。我们感受到中国到处在恢复学术活动,充满学术活力,显示着勃勃生机。〔1〕

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吃惊。甚至从1976年11—12月间开始,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要求放弃极“左”时期僵化的教条主义(“整个古代史就是一部儒法斗争史”),而采用一种新的经验主义原则(“实事求是”),以适应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2〕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批判“影射历史”。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领导者间的政治斗争,常常被历史事件所影射。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两年后的1961年,北京大学的明史专家吴晗写了一个剧本,歌颂16世纪一个著名的改革者,以证明彭德怀元帅反对毛主席有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与其反对者们的争论首次表露出来,具体表现在对儒家的“让步政策”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学术评价上。1966年,姚文元代表毛泽东进行反击。〔3〕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把中国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重新强化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权。1973年,随着“文革”派与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斗争的进一步加剧,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行为外化为批判孔子的运动。1975年,以公开指责清末“自强运动者”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方式,来中伤邓小平支持科技的努力。1976年,当江青被捕和关押后,她的行为被比附为历史上臭名昭

〔1〕 参见附录一中详细的旅行日志。

〔2〕 在我们访问的那年秋天,北京地区的历史学家们举行一次会议,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极力提倡这种新的经验主义,历史学家们更为关注当代史。参见《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

〔3〕 译者按:原文如此,吴晗当时并非北大教授,而是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从吴晗最初的意图看,他并非是影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事件。这里编者的说法值得商榷。

著的女皇武则天——在公元 684—704 年,武则天曾篡夺李唐的皇位。〔1〕

美国历史学家们有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过去的兴趣与当下并没有什么关系。那种特别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学在中国并不存在,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历史学大多与现实相关。过去二十年中,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当代政治事件和政治阴谋关系太过密切了。我们访问期间遇到许多学者向我们承认,因为这样的“实用主义”,他们深受其苦。有几位受到公开批判,并被“下放”到乡下劳动。其他一些人的研究笔记被毁,书籍被没收和焚毁。许多人肉体受到虐待,他们私下告诉我们,有些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所害——不是被痛打至死,就是被迫自杀。事实上,我们在北京期间,报纸上正刊载明史专家吴晗最后岁月的故事,“文革”期间,他受到公开批判,并被逮捕,随之死于医院。〔2〕

当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绝不希望这样的事情重演,尽管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决定权力。为了强烈反对“四人帮”强权,他们要求容忍不同的学术观点,尤其是要求“客观而科学地”研究历史,而不是把历史作为“政治的婢女”。自上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中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出现过如此大的分歧意见,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现在已经超脱出现实政治与社会关怀了。中国领导人现在开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是一个后革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学家则在阅读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著作;而历史学家们则在分析中国成功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根源,乃是因为政治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不过,就如同西方史家个人的价值观和对当下的关怀一定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一样,在政治上认定的影射历史的危害,与学术上认识到主观的偏见,但仍追求客观性的史学,我们发现在中国二者之间仍有一个相当可观的距离。当今我们的中国同行们说他们开始客观性史学研究的实践时,我们相信,当他们追求史学的客观性时,我们彼此都有许多东西需要互相学习。

〔1〕 戈德曼(Merle Goldman),《1962—1964 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主编:《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西雅图,1973 年),第 243 页;陈超(Chien Chao),《“四人帮”把历史作为政治策略》,金思恺(Steve S. K. Chin)主编:《四人帮:垮台后第一本文集》(香港,1977 年),第 56—57 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伯克利,1973 年),第 39—41 页;魏斐德,《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史学》,China Quarterly 76,第 891—894 页。

〔2〕 吴晗被迫害的详情见于《吴晗和“海瑞罢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其中包含一篇由吴晗的儿子吴彰所写的吴晗受迫害的回忆,题为《幸存者的回忆》。本书还收录由费孝通、侯外庐等人的回忆文章,还有《海瑞罢官》的全文(我们得感谢陈学霖教授,他让我们代表团每个成员都得到这本书)。